

## 前 言

政治思想是关于国家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思考。中国的政治思想可谓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已形成比较成熟的政治思想体系。它以家庭为依托，以礼、仁为根本，以“天人合一”、“内圣外王”的贤人之治为途径，以“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为指归，意蕴博大，理想高远。这一思想在汉代被奉为正统后，一方面孕育出辉煌灿烂的政治文化，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思想体系的圆熟，使得其后的思想家难以逾越和突破这一思想模式。因此，中国的政治思想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重稳定而缺乏变化与创新、重一致而缺乏多样与开放的特点。所以如此，固然有地理方面和经济方面的原因，但就政治思想方面来说，史官文化窒息了政治思维的生机和活力则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正是在中国自秦汉以降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上，虽不乏伟大的政治家，却难以出现伟大的政治思想家的真正原因。与中国政治思想相比较，西方政治思想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全然不同的历史特点：其一是缺乏稳定而呈多变与创新。西方的政治思想不像中国的政治思想表现为稳定的一体继承关系，而表现为异体否定的关系。中世纪的神权思想是对上古希腊古典政治思想的否定，近世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理论、“社会契约论”、“三权分立”学说等又是对中世纪神权思想的否定，随之而起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又是对资本主义思想的超越和否定。否定呈现出变化，也孕育了创新。其二是缺乏一致而呈多样与开放。西方的政

治思想，在多数发展时期不像中国的政治思想表现为定于一尊的内聚一体，而呈并立多体。多国林立的政治环境，为各种政治思想和各类政治思想家的出现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各种政治学说竞相争鸣、相互吸收、相互影响，推动了政治思想的不断变革。上述情况，正是西方虽不多见伟大的政治家，却不乏伟大的政治思想家的的重要原因。政治思想的发展与革新，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到近代以前，西方无论在思想方面，还是在综合实力方面，已远远地走在中国的前面。

1840年，随着中国封闭的国门被打开，外国的各种政治思潮相继传入中国，中国的政治思想不再走独自发展的老路，开始与外来的各种政治思想直接触和冲突。在中西政治思想冲突的背景下，地主阶级的改革派首先起而抨击封建弊政，倡导学习西方，开始睁眼看世界。从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但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sup>①</sup>这一时期，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从整体上看，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在西方强大的政治思潮的冲击下失去独尊的地位；另一方面，西方资产阶级各种政治思想被作为救国的良方相继引入试验而遭失败，整个思想界处于多元对立、新旧并存的混杂状态。尽管“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但人们的思想却开放了，敢于主动吸收和选择救国救民的思想真理了。

1917年，“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1469~1470、14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sup>①</sup> 1919年，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爆发了五四思想解放运动，先进的思想先驱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有组织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努力。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进一步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此前后，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思想再次涌入中国，形成了波澜壮阔的思想转型的历史时代。在各种思想的冲突和斗争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其救国救民的科学性和实践性而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建立了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发展前途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的总结中，作出的最理智、最正确的历史选择，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的客观结局。从此，中国的政治思想进入了当代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当代中国的政治家和关心国家政治生活的人们对当代中国的国家性质、国家结构形式、国家管理形式、阶级状况、政党状况、政治生活状况、政治决策、政治发展、政治参与等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所作的理论性思考。它可表现为体系化的思想形态，如形成一种理论；也可表现为非体系化的思想形态，如提出一种主张、观点和看法等。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应以研究上述层面的思想及其发展、演变为内容，尤应以研究何为社会主义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及其发展、演变为主线和中心内容，并进而揭示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和特点，总结其有益的经验 and 启示。如此，既可拓宽与深化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14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当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又可为正在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

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演变的基本线索，根据其内在的轨迹和特点，可以划分为八个历史阶段。从 1949 年 10 月到 1952 年 12 月为第一阶段。这是诞生于革命胜利基础之上的共和国实践共产党人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提出的“建设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思想的时期，它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想进一步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石。从 1953 年 1 月到 1956 年 4 月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在前一阶段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尤其是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根据苏联的建设经验和自己的理论认识，对此前提出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进行了新的思考，提出了“立即开始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嬗变，是当代中国政治思想进程中具有重要转折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变革，其思想成就远大于其思想局限和失误。从 1956 年 4 月到 1957 年 5 月为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苏联模式反思的基础上，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富有创见和科学求实的探索。这是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最早萌动期。从 1957 年 5 月至 1960 年 6 月为第四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对知识分子政治属性和作用、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阶段等问题的认识与实践上，出现了严重的摇摆、重大的失误和明显的分歧，表现了以脱离中国实际和否定革新思想为特征的指导思想上的自我困惑和矛盾。从 1960 年 6 月到 1966 年 5 月为第五阶段。在这一阶段，一方面鉴于对社会主义问题认识的困惑和实践上的严重挫折，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若干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学习和探讨，从而澄清了思想理论上的某些困惑，对“左”倾错误进行了一定的反思和纠正；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思想理论上的困惑未能得到根本解决，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

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困惑使党内最高领导层在社会主义探索中的认识分歧和冲突愈益增加。而从根本上说,这些冲突是始终存在的,只是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在前期这种冲突未能表现出来。从 1966 年 5 月到 1976 年 10 月为第六阶段。这一时期,一方面,居于指导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支配中国思想界长达十年之久并发展到“极致”;另一方面,人们对“左”倾错误思想的抵制、对社会主义真理的坚持和捍卫从来没有停止过。正是后一方面思想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思想基础。尽管如此,“文化大革命”十年从整体上看无疑是给思想界造成巨大灾难的时期。从 1976 年 10 月到 1981 年 6 月为第七阶段。这一阶段,一方面,思想界仍受“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另一方面,随着新的历史时期的社会实践对“左”倾教条主义的冲击,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大讨论,人们从“左”倾教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完成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从整体上看,这是从“左”的教条主义思想束缚期到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恢复和发展期的转型阶段。从 1981 年 6 月到 1992 年是第八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开创了中国政治思想健康发展的新时期。

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是以当代中国的国情为母体、以社会主义为灵魂、以现代化为血肉的新的思想体系。它既不同于中国的传统的政治思想和中国近代的政治思想,又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思想,也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思想。它是自成一体的,又是广取博采的;它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它是一体的,又是多样的;它是稳定的,又是革新的;它是注重优秀传统的,又是导向现代化的;它是革命的,又是渐进的;它是注重思想教育管理和集中的,又是力倡法治和民主的;它曾有幼稚甚至荒唐的昨天,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正在摆脱幼稚,走向成熟。当然,探索的道路还很长、很长……

## 第一章

# 基石：建设新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思想（1949年10月～1952年12月）

当代中国之建国初期的政治思想，是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阶级、政党等重大问题的理论分析，皆以此性质作根据。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为刚刚创立的共和国确定了国体、政体、党派合作模式、临时大宪章。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阶级关系和社会基本矛盾作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和分析，初步构思了一个比较适合建国初期社会发展需要的政治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既表现出与建国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关建国理论的继承性和一致性，又表现为对共和国未来政治思想发展的奠基性，其意义深远。

## 一、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观

### （一）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国体和政体的构思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本国情出发，阐明了中国革命是由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归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革命的直接结果是使中国进入一个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从 1935 年 12 月到 1949 年 6 月，毛泽东

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五四运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一系列文章中，明确指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现实目标是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政权”、“新民主主义制度”、“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进而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并详细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和政体。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国体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sup>①</sup>他考察了当时世界上存在的三种国体（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指出：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是旧民主主义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没有民主气息，已经转变或即将转变为资产阶级的血腥的军事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除苏联外，正在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酝酿着，将来它必定会成为一定时期内的世界统治形式；而中国革命的结果只能采取第三种形式，即“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sup>②</sup>。毛泽东还指出，在这种政权中，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sup>③</sup>。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国体的这种构思，是基于中国国情所作的科学分析，为以后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2卷，676、675、674～6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指出，政体“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sup>①</sup>。“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sup>②</sup>同时，毛泽东强调“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sup>③</sup>。毛泽东认为，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同时才能表现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简言之，“政体”就是国家的管理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参照巴黎公社与苏维埃的原则，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出来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建国初期并未立即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规定由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其职权。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迫近，毛泽东又进一步思考了这一问题。在 1948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 无产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sup>④</sup> 1949 年初毛泽东又对人解释说，采用这样的国体和政体是由中国的政治条件、经济条件、革命条件、群众条件以及采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 67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29 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用这种形式最利于与民主人士合作等诸多因素决定的。<sup>①</sup> 在 1949 年 3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强调：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sup>②</sup>

同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著名论著中，又从历史、现实和理论结合的高度对新民主主义的国体和政体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sup>③</sup>在“现阶段”“人民”这一概念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对“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sup>④</sup>对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

<sup>①</sup>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29 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4 卷，1436～1437、1471、147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sup>①</sup>。这个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sup>②</sup>。

毛泽东的上述设想和论述，反映了他对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落后大国在革命和革命胜利后的政权的历史类型、组织形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适合中国独特国情的深刻认识。中国的革命是在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一再失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走不通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 缺乏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革命胜利后马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此，中国革命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革命的直接结果，既不是建立资产阶级历史类型的民主共和国，也不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历史类型的民主共和国，而是创建一种新型的适合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实际状况的新民主主义历史类型的民主共和国。毛泽东的这种创造性构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大发展和贡献，也是对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世界政治思想史的一大贡献。毛泽东的上述构想，表现了他关于新民主主义国家观的历史一致性，是他长期研究和思考的结果。这为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临时大宪章——《共同纲领》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

## （二）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

早在建国前 1948 年的下半年，刘少奇就开始对新中国的政权性质问题进行思考。他这一时期的两篇报告——《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问题》和《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方针与问题》集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民主革命胜利后，还不能马上直接采取社会主义的实践步骤。“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的政策是要不得的”，“过早

<sup>②</sup>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4 卷，1475、147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sup>①</sup>也就是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为什么呢？薄一波后来曾对刘少奇当时这种认识的理由作过分析。

第一，条件不成熟。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顶多占 10%—20%”，“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由于此”。<sup>②</sup>

第二，搞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实行公有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历来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具有革命性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联合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革命后的政权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还要请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因此，我们不能像俄国二月革命后那样，立即采取推翻资产阶级、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做法。<sup>③</sup>

第三，客观上还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来发展经济。因为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当时的国民经济中占着较大的比例，如果过早地消灭了，“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sup>④</sup>。

薄一波的分析是符合刘少奇当时的思想实际的。

刘少奇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的过渡性特点，提出通过“经济竞争”<sup>⑤</sup>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矛盾。他认为，由于无产阶级手中有领导权，并且掌握了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只要引导得当，是可以取得胜利的。但是“决定的东西是小生产者的向背，所以对小生产者必须采取谨慎的政策”。他指出，“单是给小生产者以土地，

②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47~48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④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48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⑤ 刘崇文、陈绍畴主编：《刘少奇年谱》，下卷，16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只是建立了领导权，还须进一步使他们成为小康之家”。要通过合作社（主要是指供销合作社）的形式去团结他们。“合作社是劳动人民的集体经济，与国家经济相结合，建立同盟，走向社会主义”<sup>①</sup>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刘少奇到天津作调查，同工人、干部、职员、资本家等各方人士座谈，宣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这期间，他前后作了 10 篇报告，围绕着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态度问题，阐述了他经过深入调查和思考而形成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思想。建国后不久，围绕对待城乡私人经济的态度问题，刘少奇继续就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明确提出了“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sup>②</sup>的思想。下面就他这一时期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问题的思考的具体方面进行阐述。

第一，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条件下，要正确估价资产阶级的作用，认为在当时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有其进步性，还不能把资产阶级作为斗争对象，强调和资产阶级的较长时期内的合作政策。

刘少奇于 1949 年 4 月中下旬对天津的工商业情况作了一定的调查后，4 月 28 日在出席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的讲话中，从工人阶级利益的辩证角度这样评价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

其他国家的资本家都发达了几百年了，而我们才几十年，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条件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sup>③</sup>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49 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刘少奇选集》，下卷，6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③ 刘崇文、陈绍畴主编：《刘少奇年谱》，下卷，201 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并指出 在当时的中国‘不是资本家太多 太发展了 而是太少 太不发展’<sup>①</sup>。同年 5 月 10 日，他在唐山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再一次讲到了资本家的作用问题。他说，资本家是要剥削工人的，但是他的剥削方式是资本主义的，不是封建主义的，今天我们不但不反对，而且要发展，等将来发展到生产过剩，再限制。<sup>②</sup>为什么对资本家的剥削‘不但不反对 而且要发展’呢 显然 刘少奇是想利用资本家为当时生产状况落后的中国发展生产。

正是鉴于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生产的作用，刘少奇尖锐地批评了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斗争对象的“左”倾错误。他说：如果把民族资产阶级当成斗争对象，“则是犯了错误……这错误是路线错误”<sup>③</sup>。他指责这种错误情绪和行为说：进城了，敌人看不见了，就把眼睛盯准‘大肚皮’工商业资本家 把子弹朝他们打来 像农村分田地一样 要分工厂、汽车、洋房、机器 或向他们提出过高的工资要求；或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或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的坏，不说他们的好；干部、工人不敢接触资本家，否则就是立场不稳。总之，只强调斗争的一面，不强调联合和利用以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这是一种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行为。<sup>④</sup>他在 1949 年 5 月 31 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致东北局的电文中 针对当时存在的对资本家的‘左’的行为 严厉地批评说：“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

对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及矛盾问题，刘少奇认为，我们要和资产阶级合作，现在的主要矛盾还是国外矛盾，即与帝国主

<sup>⑤</sup> 刘崇文、陈绍畴主编：《刘少奇年谱》，下卷，201、209、212 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sup>④</sup>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52 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义的矛盾，要引导人民注意国外矛盾。我们不要太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太强调，帝国主义就会插进来。除开国外矛盾，单就国内矛盾来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确是基本的矛盾，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尚不能脱离，可以拖十来年，到无产阶级不需要资产阶级也能活下去的时候，就可以搞社会主义。<sup>①</sup> 在这里，刘少奇仍从发展生产需要的角度，论述了和资产阶级合作的必要性。

从上述所引诸多资料中可以看出，刘少奇从发展生产力以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理论高度，对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条件下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应采取的态度和政策等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和详细的阐释。他的这些分析和阐释，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也是很有见地的。

第二，正确评价城市私营工商业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认为私营工商业应在一定范围和较长时期内存在和发展。

1949年4月24日，刘少奇在天津市干部会议上谈到贯彻劳资两利政策时，对私人资本主义的作用给予了肯定。他说：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发展是进步的，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因而他强调，必须贯彻公私兼顾政策。我们党、政府、贸易局、国营工厂必须主动地联合资本家，主动地同他们合作。必须做到劳资两利，使资本家有利可图。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今天还不能废除。<sup>②</sup> 同年5月2日，他在部分行业的工商业代表座谈会上指出：现在私人资本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生产。我们的政策是劳资两利。因为不这样，要想把农业国家变为工业国家就不可能。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青年时代，正是发挥它的

<sup>②</sup> 刘崇文、陈绍畴主编：《刘少奇年谱》，下卷，208、19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应赶紧努力，不要错过。<sup>①</sup>5月31日，他针对不顾“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而“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的“左”倾错误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sup>②</sup>1951年5月31日，他从不要破坏生产力的角度，谈到不要伤害私人资本而过早采取社会主义步骤的问题。他说：实行社会主义至少需要十年二十年之后。如果目前即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对人民是无益的。伤害私人工业生产的积极性，无疑地是破坏着目前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这是“左”的错误。<sup>③</sup>对于私人商业问题，刘少奇在1950年5月20日给薄一波等人的信中指出：“私人商业在相当广大的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大量的商品还要经过商人的手送给消费者和生产者。因此，这些直接间接经过商人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获得者，就还不能免除或还不能完全免除商人的中间剥削。而在目前，企图用国家商业与合作社商业去全部代替私人商业的思想那就是一种错误的‘左’的思想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sup>④</sup>

刘少奇对城市私人工商业经济的地位、作用与前途的认识，是与前述他对资产阶级的分析相联的，也是相一致的。实际上，刘少奇对资产阶级的认识，是以他对城市私营工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为根据的。他既然认为私营工商业在一定范围和一定时期内的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所允许的，那么在这个时期内就应该看到资产阶级的积极作用。

第三，正确评价土改后的农村私人经济的作用，认为不要过早动摇农民的私有制。

建国后，面对土改后农村阶级关系的分化和新富农的出现，地

<sup>①④</sup> 刘崇文、陈绍畴主编：《刘少奇年谱》，下卷，204、212、279、25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方上的部分干部表示担忧，提出要通过合作社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的办法逐步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制并战胜农民自发因素的意见。对此，刘少奇指出，这实际上是现在就想提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他认为“合作社是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可是单用这一种十家八家组织的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因为仅仅依靠农村的条件不能搞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有了国家工业化，才能供给农民大量的机器，然后实行土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才有可能。……以为目前组织合作社就可以改造中国的农业，使个体的小农经济走上社会主义的农业去，那是幻想”<sup>①</sup>。1951年7月，他对党内一部分人害怕资本主义发展、企图用平均主义去战胜资本主义的错误想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sup>②</sup>并说，实行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要触动私有制。中国的产业落后，过早实行工业国有化，只会伤害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对发展生产不利。在农村，国家拿不出机器、化肥等工业品以满足农民的需要，实行集体化也不可能。总之，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私有制在今天中国的条件下，一般地还不能废除，并对提高社会生产力还有其一定的积极性”<sup>③</sup>。

刘少奇在强调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中国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31～32、33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60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他说，“中国将来的前途，是要走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去的”，但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对于这些事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很可以在将来加以讨论。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到了那时候，中国共产党也一定要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并共同地加以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将来也愿意和一切愿意进入社会主义的人们一道，共同地进入社会主义”。<sup>①</sup>

概括说来，刘少奇认为当时党和国家的总任务和总战略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而不是立即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正如他在1951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所说，“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sup>②</sup>刘少奇在这里显然将新民主主义社会看成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而且要为这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巩固而斗争。他的这些设想本来是来源于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的。早在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毛泽东在构建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时，就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相对独立性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他在1940年1月所作的《新民主主义论》<sup>③</sup>中指出，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而第一个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

《刘少奇选集》，上卷 43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刘少奇选集》，下卷 62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该文是1940年1月毛泽东的讲演稿，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延安《解放》杂志同年2月第98、99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